

陈寅恪：国学大师的悲情与坚韧

国学大师陈寅恪给世人的印象是“身体太弱，健康不佳”，在全面抗战期间更是疾痛缠身。1937-1945年，陈寅恪频繁表达了他在恶劣环境下“大病几死”的感受。

深受疾痛纠缠

心悸是陈寅恪常提到的症状，曾让他“几死于昆明”。心悸患者常感到心跳强而有力，有时心率快如赛马，心跳剧烈得像要从口中跳出，对此陈寅恪曾描述为“心荡”和“因心跳出冷汗”。他一般在夜间入睡时症状明显，以致长期失眠，只能依靠安眠药。

1940年2月26日，避乱昆明的陈寅恪致信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：“弟此次之病甚不轻，即心悸心跳，所谓怔忡者是也。”频繁的心悸令他苦倦不堪。医生认为心悸是神经衰弱和脚气病所致，而陈寅恪则以为除此之外尚因“昆明地高”，自己无法适应。

陈寅恪也经常抱怨自己头晕目眩，以致精疲力竭，无法集中精力读书、写长信。只是与心悸相比，陈寅恪对眩晕的表述相对客观简洁。这一症状很可能亦与神经衰弱有关。目眩则可能与用眼过度导致的视力恶化有关。1937年秋，陈寅恪的右眼因视网膜剥离而失明。他的左眼则是

1944年12月在成都时失明的。在左眼失明前夕，他曾向朋友感叹：“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……终日苦昏眩，而服药亦难见效，若忽然全瞽，岂不大苦，则生不如死矣。”可见昏眩既是视力衰退的症状，也加剧了他对失明的不祥预感。

消化不良亦困扰陈寅恪多年。1929年，陈寅恪致信傅斯年云：“弟……近复失眠不消化，故亦病废矣。”1937-1945年间，他对这一症状的抱怨更是不胜枚举。同事浦薛凤亦回忆陈寅恪“胃不甚健”，下午吃点心时需同时服用消化药片，还说“我此刻觉饿，要吃些点心，但如不加消化剂，则晚餐时又不想吃”。其原因虽不能确知，但据以上史料，不消化常与失眠并举，似与神经衰弱关联密切。

经济困难也是陈寅恪深受疾痛纠缠的重要原因。陈寅恪早年家境殷实，早已适应了优渥、舒适且西化的生活。抗战以来，陈氏夫妇和小女美延都体弱多病，尽管得到多方资助，但由于医药支出不菲，家用仍然拮据，生活品质严重下降。20世纪40年代以后，陈家的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，陈寅恪不得不与妻子轮流诊治服药，有时甚至只能忍病不治。

劳忧过度降低了陈寅恪的抵抗力，成了他“百病转发”的又一重要原因。以学术为天职的知识分子本就容易消耗过多的精神，而战乱更使国难、家愁和个人的不幸叠加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作为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，陈寅恪在身体过劳的情况下仍认真讲课。而作为急切想为学界留下更多成果的学者，他则用尽全力进行著述：“作文……幸尚不十分累，我亦知停止最好。此我详细酌量我之身体及时局而为之者……”加之两次丢失书稿、妻女病困香港、经济入不敷出、身边缺少知音等因素，他难免经常处于疲倦、痛苦的状态中，以致常向亲友抱怨。对于双目失明的厄运，陈寅恪则认为他自幼嗜书，常于夜间在被褥里偷偷读书，用昏暗的小油灯照明，而且文字细小模糊，久之形成高度近视，视网膜剥落遂不可幸免，“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”。

焦急、烦躁和失望

短短几年内如此频繁的症状表达在陈寅恪的一生中绝无仅有。当疾病在他生命中愈来愈有难以承受之重时，其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亦将与之难解难分。

1945年春，在多次手术未见成效后，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决定先事休养，再求良医。他在诗中以“蹉跎病废五旬人”自况，又有“去年病目实已死，虽号为人与鬼同”之叹。毫无疑问，疾痛给他的生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——尽管疾痛绝不是唯一的、决定性的影响因素。

此外，陈寅恪还时常抱怨疾痛带给他的精神困扰，“苦”与“倦”是较多被提及的状态。左目失明后，他“眼被遮蔽，头不能动，心情很苦闷”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过程中更加焦急、烦躁和失望，乃至有“泪眼已枯心已碎，莫将文字误他生”之叹。疾痛与国难家愁交织，一起让陈寅恪自感“忧闷不任”“心绪甚恶”“心绪甚不佳”“进退维谷”，以致在一段时间内懒于给亲友写信。

在疾痛的长期折磨下，陈寅恪对自己的身体极度悲观，乃至有“今则知国命必较身命为长”的衰颓预感。从后来他对这段疾病体验的追述——“病榻呻吟，救死不暇”“大病几死”便可以看出，重病致死的潜在可能在他心中投下了深深的阴影。纵然如此，他还是在病中认真备课，继续著述。在听闻友人

因伤寒逝世后，他以“年长者不必皆较年少者先死，体弱者尤不必较体壮者先死”自嘲。经亲友多方劝导，他重新振作，逐渐走出失明阴霾，以“闭目此生新活计，安心是药更无方”明志。

“以耳代目、以口代手”

疾痛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亦影响深远。陈寅恪早年对著述态度谨慎，从不轻易下笔，在“七七事变”前只是发表了若干论文和序跋，并未著书。然而随着战局危殆，一方面让他改变了待人接物的方式，对于指导与提携后学不遗余力；另一方面离乱和疾痛带来的死亡预感越发强烈，使他意识到“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”，从而“随顺世缘”“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”抓紧著书。

陈寅恪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便如是说：“甚希望能于神识未离身体时得完成此作也。”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和稍晚写成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并称“三稿”，是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代表作。其中前“两稿”作于1939-1941年间，更是他自我期许极高的著作。

陈寅恪的助手邓广铭回忆，在昆明青云街居住时，陈寅恪经常卧床呻吟，哀叹自己命不久矣，但又总说：“如果我不写完这两稿，就死不瞑目！”而陈寅恪在书信中的自白亦可透露“两稿”对他的意义所在：“敝帚自珍，固未免可笑。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，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……”可见，只要“自作纪念”的“成绩”写成并顺利出版，他甚至“夕死可矣”。正是这样的态度，才让他克服“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”的困难，并不惜“急急于争利”，利用疾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，使“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”，从而留下传世之作。

双目全盲后，陈寅恪自感已变成“旧学渐荒新不进”的“独卧文盲老病翁”。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，不过，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，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，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。因此他开始调整自己著书立说的方式，“以耳代目、以口代手”，努力做到瞽而不废，并最终恢复讲课。妻子唐筼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，帮助他誊写文稿；石泉、王永兴、汪篔、黄萱等弟子陆续担任他的助手，协助他著书和教学。从此，陈寅恪在无尽的黑暗中钻研学术达20余年，直到离世……

据《书屋》安楠/文

